

“上海好剧”，为什么这样红？

本报记者杨金志、孙丽萍、郭敬丹

上海老弄堂中婉约曼妙的旗袍群舞、电影大片式的谍战情节、震撼人心的生离死别……一部风靡全国的精品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奠定了上海红色革命题材舞台作品的标杆。

其实，上海并不只有一部“电波”。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这里的文艺舞台正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众多“上海好剧”竞相登场。上海好剧是红色的，因为它们浸染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上海好剧很红火，因为精良的打磨和用心用情的演绎，它们感人至深、“吸粉”无数。

“辅德里的炎夏，实在太好哭了”

“你会不会想她？辅德里的炎夏，少年奔向了远方，旧皮箱装满理想……辅德里在守望，那永远的信仰……”舞台上，歌声激昂嘹亮。大幕徐徐落下，台下依然掌声雷动，观众泪光点点。

近期，上海市静安区出品的非虚构戏剧《辅德里》在上海、南京、合肥、杭州等地巡演，在年轻人中掀起观剧热潮。充满文艺气息的旋律具有让人“过耳不忘”的“魔性”。许多人走出剧场，眼中还含着热泪就已经开始吟唱其中主题曲。

辅德里是上海市静安区内的百年石库门里弄，中共二大会址所在地。1922 年召开的中共二大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辅德里》即讲述中共二大的历史和中共早期党员守护党章的故事，这也是“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倾力打造的红色题材委约作品。

《辅德里》完全打破传统戏剧的窠臼，用清新、青春而动人的音乐旋律，让一部“党章戏剧”入耳、入心。今年 4 月首演以来，这部上海好剧巡演所到之处都引起轰动，创下 86 天内累计演出 30 场、平均每 3 天就演出一场的佳绩，实力诠释了如何用当代审美、当代气质去“激活”红色文艺题材的强大感染力。

“舞台上白衣白发的他们，像一座座雕塑，也像流动起来的人民纪念碑……”“实在太好哭了，哭得我口罩都湿了，但牢牢记住了这句话——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我也愿意为了我的信仰牺牲我的生命！”不少深受震撼的“95 后”“00 后”观众纷纷在网络上留言，



在上海新创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上，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成功首演。（上海昆剧团供图）

从这部红色戏剧中，感受到 100 年前“90 后”建党先驱的伟大和“热血”。

《辅德里》出品人、上海市静安区委宣传部部长姜鸣认为，《辅德里》的成功，源于让“90 后”挑大梁担纲创作，让今天的“90 后”自己去走近、读懂和讲述百年前同龄人的热血青春故事，发挥年轻人的主观能动性，让红色地标“活”起来、“潮”起来。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90 后”们一头扎进他们之前感到陌生的史料中。他们在重温历史的过程中一点点还原革命先辈的“血肉和灵魂”，在拂去时代尘埃而浮现的丝丝缕缕细节中，发现了“伟大是这样具体，牺牲是何等壮丽”。

提起红色革命戏剧，有人或许会想起样板戏、高大全的革命者形象、脸谱化的反面角色。其实，诞生于当下的上海红色好剧，早已跳出这些窠臼，呈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文艺张力。

让年轻人走进历史，以青春激荡青春，带着这一代人的疑惑与好奇去亲历、亲睹、求索，寻找信仰与牺牲的不变答案——沪上文艺创作者正以打破套路、直击心灵的艺术呈现，让观众们与革命者“灵犀相通”、心潮澎湃、泪水奔涌。

“我们，为何而死？”这是真正的灵魂拷问

“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1931 年 2 月 7 日，这群年轻的革命者在上海龙华牺牲。他们被称为“龙华二十四烈士”，其中包括五位青年左翼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和殷夫。今年 7 月伊始，两部上海原创舞台剧不约而同聚焦左联五烈士青春热血的革命故事。

“他们的人生，本来有很多选择。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么活？”

“我们，为何而死？”……

面对同样的题材，两组不同的创作者却分别选择了“如何生”“为何死”的不同演绎方式。

上海戏剧学院出品的舞台剧《前哨》，被观众们称为一部独特的“红色穿越剧”。这部舞台剧搭建了 90 年前后年轻人互相穿越的时空——大幕开启时正是 2021 年的“当下”，一所艺术大学内的导演系学生苦恼于排

演“左联五烈士”的戏剧。于是，他们带着许许多多的疑问走近历史，试图触摸百年前同样青春飞扬的那群革命者的灵魂。

他们走进了上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东方旅社、在“现场”旁听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慷慨激昂的决议；他们也和当年的文艺青年们一起搬着小板凳，围拢在鲁迅先生身边，听他侃侃而谈时代的困境、文学的价值和青年的使命。

如果说《前哨》演绎的是“出生入死”，舞台剧《浪潮》则反其道而行之，采用“向死而生”的叙述手法。独具一格的水舞台上，铁链将 3 块厚重木板悬吊空中，营造出强烈和扣人心弦的舞台空间。整个故事从左联五烈士牺牲时的那一刻展开：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烈士们的意识在另一个空间相遇——他们叩问自己到底为何而死、探讨死亡的真意、寻找选择革命的初心——这部戏剧同样有着时代特征的“穿越”元素。

两部左联五烈士题材舞台剧“打擂式上演”、互相映照，折射出上海全力创作“红色好剧”的热烈气氛。《浪潮》导演何念说：“我们不曾忘记这些烈士的故事。如果回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苟活与为理想牺牲之间，在那样的选择面前，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加入队伍、成为他们。”以编剧身份全程参与《前哨》创作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说：“红色题材的核心，就是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思考我们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

《前哨》与《浪潮》，正是上海好剧浪潮中的朵朵浪花。今年上半年，上海推出“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和“新创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展演季中，《江姐》《芦荡火种》《白毛女》等 12 台红色经典剧目重归舞台备受瞩目，交响曲《百年颂》、声乐套曲《永恒的丰碑》、芭蕾舞剧《宝塔山》、京剧《换人间》、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都市新淮剧《寒梅》等新创舞台艺术作品又接踵而至。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初心使命永放光芒

“上海好剧”，为什么这样红？中共上海市委明确提出，要用好用活上海丰富的红色资源，精心组织文艺创作，在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进程中进一步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让红色血脉、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让伟大建党精神和党的初心使命永放光芒。

评论界认为，作为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革命实践地，上海的城市血脉里始终流淌着红色基因，为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资源。立足上海、立足当下，以今天中国人的视角去切入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从而让历史与当下水乳交融，这是上海新时代红色文艺创作的鲜明特质。

从新天地的中共一大会址，到中国共产党党章在辅德里“诞生”；从石库门里的秘密电台，到龙华烈士陵园里延年、乔年的长眠之地……百年来上海拥有波澜壮阔的城市历史，积淀着从历史到当下浩瀚的红色素材，无疑是一座红色文艺的宝库。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党中央早期驻扎地，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红色文化代表着人类追求幸福的理想，以及为实现这种理想去奋斗、奉献、牺牲的共同精神力量。深挖红色文化资源，上海责无旁贷。而在真实的历史和现实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红色文艺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它们会影响现实、构建未来。”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说。

而在挖掘上海红色记忆的过程中，注重文艺创作的当代表达、当代审美，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与他们共情共鸣，则凸显了上海红色文艺创作的不断探索与提升。

这样的探索与提升，在近来的上海舞台上随处可见：京剧《换人间》、首次尝试将贝多芬交响作品融入京剧；舞台剧《浪潮》使用水元素，让演员们始终被时代的潮水“包裹”和冲击。不久前登台首演的现代昆曲《自有后来人》重新讲述《红灯记》故事，勇敢打破昆曲官调套式的枷锁，让古雅水磨腔的昆曲唱起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现代革命戏……

红色好戏连台，依靠的还有沪上文艺界的薪火传承。为了创作《自有后来人》，81 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与 80 岁的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肩并肩战斗”在创作第一线。两位大师反复切磋、守正创新，于耄耋之年推进昆曲艺术现代化，带领着青年一辈再造红色经典。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上海文艺舞台上的文艺“红”、革命“红”，正在丰富和滋养着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正在向世界骄傲讲述它历久弥新的英雄故事。

佛首终返天龙山，百年漫漫“归乡路”

本报记者王学涛、徐伟、柴婷、韩依格

天龙山一座仿古展厅里，3D 打印的第 8 窟局部，给人身临其境之感。中心展柜里，一尊佛首双目微闭，笑意盈盈。在海外漂泊近百年后，今年 7 月，它正式回到家中。

这是天龙山石窟第一件回到原属地的海外流失文物，也是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国的天龙山石窟流失文物。

“文物回到诞育它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才能更好呈现其独一无二的文化价值、历史内涵。”在太原市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工作了 24 年的馆长于灏说。

佛首捐赠人张荣表示，这尊佛首从日本回归故土在他的人生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希望通过捐赠，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鼓励更多人参与到文物回流事业中。“下次文物捐赠回归，也许是你，也许是他，期待大家都来尽一份绵薄之力，点滴之水，终成洪流。”

日本学者：“东方文化遭此荼毒，使人情何以堪！”

1918 年，天龙山石窟进入日本人的视野。那年 6 月下旬，日本建筑学家关野贞到太原调查古迹。他根据地方志的记载，30 日早晨，顶风策马，前往天龙山。随着道路日益险峻，他弃马攀登，最后在快到绝顶的地方看到有北齐、初唐的石窟，喜不自胜。于是晚上投宿附近寺庙，第二天继续调查，直到黄昏才返回太原。虽然带的胶卷不够，但还是对大多数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与拍摄。

天龙山石窟距离山西太原市区 30 多公里，东魏大丞相高欢、北齐文宣帝高洋曾在此修建避暑宫、开凿石窟、兴建寺院。天龙山石窟始凿于北朝东魏时期，历经北齐、隋、唐等不同时期开凿，现存洞窟 25 个，造像 500 余尊。

在《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一书中，关野贞这样评价天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之特色在于留存他处罕见之北齐、隋初石窟与拜殿雕有的建筑物细部，以及留存唐初雕刻之杰作。天龙山唐代石窟规模虽小，然手法精练，凌驾于龙门唐代石窟之上。

当时在关野贞看来，天龙山石窟因位于山间偏僻处，来访者少，人为破坏亦少，故较能以当年原貌留存至今。继关野贞后，日本佛教史学家常盘大定、日本学者田中俊逸等纷至沓来。天龙山雕刻艺术

名满天下时，也招来不法商人贪婪的目光和欲望。

常盘大定不久便知晓天龙山石窟遭劫。1925 年，他委托庆应大学学生赵青菁与太原美丽兴照相馆老板，前往天龙山实地调查并拍照。但当他们进入石窟后，却被眼前情景所震惊。

“惊闻天龙山石窟几无幸免，尽遭破坏，其状不忍卒睹、令人心酸。东方文化遭此荼毒，使人情何以堪！”常盘大定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一书中写道。

专家认为，自关野贞考察天龙山石窟之后的几年里，石窟造像被生生凿取，有的整体被盜，其惨状难以言表。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但与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及山中商会有直接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在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天龙山石窟 240 余尊造像被盜凿，150 余尊成为国外博物馆和私人的珍藏。

借画回乡：“希望它有一天能漂洋过海归来”

对它们的思念，成为当地画家张晋峰艺术创作的源泉。

一幅幅或彩铅或水墨、或写实或超现实的画作，不像出自一个不曾见过佛像真容的画家之手。透过层层叠叠的勾勒，能看出佛像的斑驳和历史的起落。

名为《佛殇》的彩铅画上，一尊佛首横卧，双目微闭，微微上扬的嘴角带着似有似无的神秘笑意，流畅自然的曲线到颈部后消失，躯干位置被氤氲水汽替代。水流将佛首轻轻托起，送往未知的终点。

“我希望它有一天能漂洋过海归来。”张晋峰说。

张晋峰出生的村庄距离石窟还有一段距离，但他从小就听村里人讲天龙山的故事，长大参观后才发现早已无缘再睹昔日佛容。

“想象和现实之间有落差。”张晋峰说，有一次他参观石窟，准备离开时，一束阳光打到洞窟里，照在一个残缺的佛像上，石质的斑驳感很有温度。“那种佻寂之美，让人心动。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让人们发现这种被淹没的、遗忘的、失落的美。”

张晋峰开始为流失海外的佛像作画。他从网络上、书籍里搜索照片，拜托朋友帮忙拍照，他走进石窟凝视造像细节，找寻古人创作的灵感。

“他能连画 3 个小时不起来，为了这事什么也顾不上。”张晋峰的妻子李清玲说。

7 年间，张晋峰创作了近 80 幅天龙山流失海外的佛造像。3 年前，他的展览在太原美术馆顺利开展，天龙山石窟流失海外佛像“借画回乡”。

在他的诸多作品中，一幅等身大的全身佛像尤为吸引人。佛像盘腿而坐，祥和的面庞下方，脖子上有一道刀痕。旁边，一幅水墨画描绘的就是该佛像的原址，如今，空荡荡的石窟里只剩下片片残影和当年被盜时留下的道道刀痕。

“希望用我的方式，铭记历史，激发大家保护文物的意识。”张晋峰当然更盼望实物能回归故里，“这里毕竟是它们的家。”

数字合体：“只有新时代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2019 年，通过数字多媒体技术，天各一方的石窟造像合归一体。

在微信公众号“天龙山石窟博物馆”上，可以在线 VR 全景欣赏天龙山石窟美景。正在天龙山石窟博物馆举办的“复兴路上 国宝归来”天龙山石窟回归佛首特展上，只要轻轻动下手，就可以欣赏到天龙山老照片、天龙山石窟已知文物在世界的分布，还能通过缩放、旋转全方位欣赏流失海外的文物。

“只有新时代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于灏说。

这一切源于多方“盼团圆”的梦想。

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赵慧说，2012 年艺术学院购买了德国设备，开始从事文物数字化工作。8 年前，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的蒋人和教授表达了想把流失海外的石窟造像与中国国内的石窟本体做关联性研究的愿望。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主动联系，表达了合作意愿。

2014 年底，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太原市天龙山石窟博物馆三家合作，开始做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项目。

目前，他们在 10 个国家的 30 多座博物馆，采集到 100 余件天龙山流失造像的三维数据，完成了 11 个主要洞窟的专业数字复原，实现了大部分流失海外造像的数字化

回归。

2019 年 7 月，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的部分成果在法国展出，当地市民排队观看，成为中宣部“中华文化走出去”重点工作项目之一；9 月，“美成天龙——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展”在太原市博物馆展出，拉开天龙山石窟科技保护成果在国内展览的序幕。

“看着它们端庄典雅、飘逸多姿、栩栩如生的形象，感到它们的眉眼、嘴角都在朝我微笑。我凝望着它们，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于灏说。

鉴定专家：“追寻造像下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李裕群对天龙山石窟的文物如数家珍。他说自己曾参与过 4 件天龙山石窟文物回归的鉴定工作：两件文物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件文物由太原商人从美国购买回国，第 4 件便是刚回到天龙山的这尊佛首。

“能参与鉴定是一种缘分。”李裕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他记不清自己到天龙山石窟走访过多少次，印象最深刻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他在写硕士论文时，之后对天龙山石窟的热爱便一发不可收拾。

“洞窟里不是缺佛头，就是残肢断臂，斧凿的痕迹让人心疼、心酸，又很悲愤。”李裕群认为，这种盜凿不仅破坏了造像本身，还加剧了风化速度。据他观察，造像被盜凿后，断面风化得更厉害。

李裕群的鉴定书，在这次佛首回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 年 9 月 14 日，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日本东瀛国际拍卖株式会社拟于东京拍卖一尊“唐天龙山石雕佛头”，疑似天龙山石窟流失文物。

李裕群告诉记者，经过他和其他文物鉴定专家认真观察，认定该佛首为天龙山石窟第 8 窟北壁佛龛主尊佛像的被盗佛首。随后国家文物局启动追索机制，确定“叫停拍卖、争取回归”的工作目标，10 月 15 日致函拍卖行，要求终止与该佛首相关的拍卖和宣传展示活动，予以撤拍。拍卖行积极配合。国家文物局与拍卖行董事长张荣取得联系，鼓励促成文物回归。

“追寻天龙山造像的下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李裕群认为，一旦有造像从私人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出现时，可以根据

洞窟破坏前的原位图片、早年的调查记录、凿痕、造像的修补痕迹、真伪问题等进行判定。

然而，李裕群感慨道，私人收藏的比较容易在拍卖市场看到，但很多已经成为博物馆的典藏品，就不好出来了，一些文物或将成为遗憾。他呼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特别是华人华侨的参与。另外，还应加强人才培养，掌握鉴别能力，为文物回归提供证据支撑。

佛首捐赠人：“希望大家共同参与”

近二三十年来，张荣多次促成海外流失文物回归祖国，其中，这尊佛首是他促成回国的第 7 件国宝。

“让身首分离百年之久的佛首，回到祖国故土，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张荣说，5 个月前，当他看到佛首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那一刻，内心非常激动，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他也收到上千条祝福信息。

由于国际规则不足、各国法律相异，加上基础研究欠缺、各方力量分散，中国石窟寺流失文物回归尚存诸多障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说，从既有的回归案例来看，当前石窟寺流失文物主要是通过捐赠、回购或主动归还的方式回归祖国的，以法律途径追索的实践尚付阙如。

对此，张荣希望大家共同参与。他说，民间参与的好处在于速度比较快，“文物回流是瞬间工作，如果不及时买下，这件文物可能一辈子与你擦肩而过。”

“我是拍卖行的老板，是卖东西的人，但也在捐赠，希望所有的拍卖行能够在发现盜卖品时跟我一样主动去做。”张荣说。

虽然现在天龙山路难走、电常停、遭盜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时常值夜班、地处偏僻的客观条件，仍然考验着这里的工作人员。

“一开始也有抵触心理，这里太安静了。”28 岁的刘颖是天龙山石窟博物馆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历史专业出身的她入职 3 年，工作已是得心应手。

年轻人来这里注入新鲜血液，而“老一代人”则为他们树立了“坚守”的榜样。

“我们要把文物看好，研究好，等着越来越多海外流失文物回家。”刘颖说。